

城市化:《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命运密码

郭 晓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个体城市化”是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的命运密码,孙少平的成长就是一个青年个体城市化的过程;“个体城市化”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孙少平的个人奋斗价值和时代意义,孙少平的“个体城市化”既是“个人奋斗者”的悲壮胜利,也是“个人奋斗者”们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孙少平;城市化;成长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3-0127-06

On Urbanization of Sun Shaoping's Fate Decode in “*Ordinary World*”

GUO 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 Urbanization”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fate of Sun Shaoping in the novel of “Ordinary World” written by Lu Yao. Sun Shaoping's growth is considered as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urbanization”, whose perspective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epochal significance of his personal struggle. Sun Shaoping's individual urbanization is a personal striver's “tragic victory”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strivers' hope.

Key words: “Ordinary World”; Sun Shaoping; urbanization; growth narrative

对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的艺术特色,研究者们展开了层次多样、角度新颖的大量研讨:从路遥的叙事立场(农本立场)、叙事地理环境特色(以路遥“最为熟悉”的城乡交叉地带为主要场景)、语言特色(包括语言本身的特色与陕北方言的应用)、人物形象(尤其关注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二人,以及一些女性角色)、人物群像(如《平凡的世界》中的“政治家”群像),以及主要人物的命运、爱情等角度进行了充分和富有见地的阐发。这些阐发颇具价值,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理解和对其艺术特色的把握。然而探讨中存在一个遭到忽略的叙述核心:青年的成长。任葆华等提出了路遥作品的“成长叙事”概念,指出这是解读《平凡的世界》的一条重要线索。^[1]实际上,《平凡的世界》的叙事正由这一核心发散开的,只有把握这一核心,才能

有效地实现对《平凡的世界》的解读。

青年的成长既表现为身体的成长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又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变化。在意识到孙少平成长的环境变迁后,我们不难发现,孙少平的成长实际是一个青年个体城市化的过程,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新视角。以个体城市化及其前提、进程和方式为标准 and 依托,本文试图勾勒作为“个人奋斗者”的孙少平的成长史(“个人奋斗者”是指那些“渴望一种真正的个人奋斗,自觉地崇拜那些凭借个人的奋斗精神使人生欲望或美好愿望实现的人”^[2]),这一“个体城市化”的全新视角有助于我们解密孙少平的现实成长及其社会意义;对整体上把握《平凡的世界》乃至路遥的其他作品,也都不无裨益。

收稿日期: 2012-11-02

作者简介: 郭 晓(1986-),男,湖北郧阳人,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 城市化的阻力——“乡土同构”的格局与“文化势差”

(一)“离土”与“离乡”

孙少平的成长(特别是精神成长)是伴随着他失去民办教师职位之后不断尝试离开乡土并最终成功“离土”这样一个过程而实现的。与孙少平精神成长史紧密相伴的是孙少平的肉身“离土”史。

首先,有必要阐明“离乡”与“离土”的区别,这对我们准确把握孙少平的“进城”具有特殊的意义。习惯上我们将“乡土”并举,这与两千年封建社会我国小农自然经济方式下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关:“乡”即是“土”,“土”即是“乡”,有“土”即是“乡”,有“乡”就要有“土”;这种心理促进了“城乡意识形态”这一文化屏障的形成。“乡”是人对憩息地的精神寄托与情感归宿,往往需要具体的物质支撑点;而“土”则无疑是“乡”的最佳选择。于是,“乡”便寄托在“土”上,形成“乡土”。但它们显然有所差异,“土”提供了人们正常生活的经济来源,是物质生活的必须,属“经济基础”;“乡”维系了人们正常生活的情感依恋,是精神生活的领地,属“上层建筑”。

对像孙玉厚这样传统的中国农民而言,他们的世界基本是“乡”“土”合一的,“乡土同构”——他们没办法实现“乡”“土”的正常分离,社会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流动(倒是可以像“二流子”王满银一样“瞎逛”,但这种“流动”是“非法”的),使他们一辈子埋都在“土”里,也就在“乡”里,没有机会去“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和“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这种现实的制约导致“安土重迁”渐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们可以轻易地从古诗文中发现这一情感倾向。与此同时,这种“乡土同构”(乡土同体)的格局,也易导致“乡民”们缺乏对“乡”的正确认识乃至难于形成较为清晰的“乡”的观念——“乡”需要在“乡”之外进行理解和体味,与“土”合一的“乡”难以彰显其独立性。

“进城”前的孙少平,对于“乡土”的情感,基本也处于这种状态。

由此不难看出,“离乡”与“离土”是两个不同的过程:“离土”主要是由于职业选择等原因在城市工作而离开了土地,如金波和他爸爸金俊海由于在

县邮局工作而已经“离土”;“离乡”则不仅包含有物理迁移的过程,更强调情感上对以“土”为主要载体的“乡”的对立和厌倦情绪。尽管孙少平选择了与传统农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他并未厌弃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相反,他认识到,农村其实是一个与城市并行的独特世界,“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3]443}他认为,在那厚实的土壤上,有智慧的人多得像天上的星星……可以说,对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村文化,孙少平是基本认同的;这种文化恰恰是“乡”的主导要素。他进城后吃苦耐劳,“揭发”远门舅舅马顺,救助可怜的打工女孩小翠,无一不是他对乡土文化中优良美德的自我实践,这些事实表明:孙少平“离土”不“离乡”,甚至可以说,他有“家庭本位”的倾向。^[4]因此,他始终念念不忘那个已经“烂包”了的家庭,不忘给他奶奶买止痛片,给要去上大学妹妹买新行头,给他爸爸寄钱准备箍象征他们家庭在双水村地位的几孔新窑。从“背着自己的那点破烂行李,从拥挤的汽车站走到(黄原城的——笔者注)街道上的时候”开始,孙少平就实现了对“土”的叛离,他脱离了对土地的依赖关系;但“乡”显然还是维系他与家庭的脐带。

“离土”后的孙少平是一个“具有乡村文化内核的城里人”:他努力克服了许多农村人的狭隘和庸俗;他并未“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抱柴禾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3]355}他没有被农村的现实同化。在城里,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3]444}最终,如他要求妹妹的一样,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对自己出身的阶层的超越”。

了解这些后,我们有必要找出孙少平“进城”的动力。孙少平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不是好混的”,知道“倘若流落在它乡异地,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付冷酷而严峻的现实了”^{[3]569};他“进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揽工

期间)里生活负担、稳定性、舒适性(基本谈不上)并不比待在“双水村”好(在双水村“有个头疼脑热,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既然如此,孙少平为什么要跨越东拉河来到黄原县城?

(二)乡村与城市:文化势差

面对重重困难,孙少平“离土”“进城”,动力何来?

对此,路遥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对此他作了模糊处理:“他(孙少平——笔者注)一个人独处这天老地荒的山野,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3]569}这是“远方的召唤”!此外,他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1]568}而此前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回头地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3]355}这体现了孙少平希望有所建树而不得的焦灼。当失去民办教师职位之后,“最使他憋闷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孙少平时常升起一种莫名的躁动:“他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头枕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眼里便会莫名地盈满了泪水,山里寂静无声,甚至能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眼眼地跳动。”^{[3]568}那么,这种种“躁动不安”表象的背后,其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孙少平的“躁动不安”?

文化势差与文明冲突。

“文化势差”是指,先进的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在落后的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面前,会产生一种“势差”,这种“势差”就像水从高处向低处流一样。在其作用下,优势文化(高位文化)会主动对劣势文化(低位文化)进行冲击和渗透。这种冲击和渗透有两种基本形式:渐进的和激进的。如果该进程较慢,低位文化就会在保持自身基本形态的前提下通过扬弃的过程向高位文化转化;如果该进程较快,低位文化则可能崩溃和解体,反映在社会方面则可能引起人们思想“迷惘”、生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对立,是先

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对立(这里的“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对立的一个侧影。从绝对意义上讲,城市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标志,这一点并无疑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乡村文明形态的完全否定。就城乡分治体制下中国的总体格局而言,城市无疑要比乡村先进、发达、有优势、更“文明”。这自然引起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是在乡村和城市对立的格局中,孙少平才面临着“进城”与“留乡”的抉择,面临着乡村身份认同上的尴尬。

文化势差所引起的前述两种形式的“文明冲突”,在孙少平生活的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都有所体现:从省城向“区域中心城市”县城黄原的温和的文化渗透带来了黄原城的渐变;前去沿海参观的省城的内地干部们,思想上受到了激烈冲击。虽然黄原相对省城处于“文化势差”作用双方的劣势地位,但它对于“原西县”和“双水村”,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由于地理位置、社会体制等的阻隔和限制,“黄原城”与“双水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互作用(有的仅是部分村民受到“城市文化”的洗礼和冲击),所以“双水村”的农村文化并未解体;但它却始终面临来自黄原城文化势差的“高压”;至于原西县,它本身就有浓厚的“农村文化”色彩。尽管作为整体的“双水村”并未受到“黄原城”和“原西县”的文化威胁,但是作为双水村居民,孙少平和金波他们,却切实地感受到了“城之诱惑”。对他们而言,城市不是同一个世界,也不是不同的世界,城市完全就是“另一个”世界!当然,他们高中接受的教育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农村学校城市化价值导向,造成农村青少年贬低农村和农业文明,崇尚城市与工业文明,引发乡村文化的缺失。”^[5]金波对孙少平说:“你现在出了门,你就知道,外面并不是天堂。但一个男子汉,老守在咱双水村那个土圪崂里,又有什么意思?人就得闯世事!安安稳稳活一辈子,还不如痛痛快快甩打几下就死了!即是受点磨难,只要能多经一些世事,死了也不后悔!”而孙少平“没想到,他的朋友的思想竟然和他如此相似!”^{[3]568-569}这正是“文化势差”在发挥作用。作为农村出身的孙少平和金波他们,面对如此繁华、美好、文明的城市,所经历的心理震颤可想而知。他们在原西县城念高中进行最初的“城市化”体验中,已开始意识到城市文明即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

间的不平衡、不对等,城市文明开始对他们显露出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孙少平初入城市时甚至觉得“城市的煤烟闻起来都有一股特别的味道”)。他们已经怀上了城市文明的孕,而乡村,显然没有可供他们分娩的地方,那么,对他们而言,只有“进城”这一条道路了。

孙少平“离土”“进城”,有一定必然性:他迟早一定会进城去!为了实现他的个体尊严与价值,他需要“进城”。以农业文明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尽管在维系社会稳定、保持人际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其压抑个体独立意识和创造力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乡村”发展机会匮乏也是乡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尽管这并非乡村本身的错)。一方面,城市文明以其美好、繁华、拥有发展机会,像磁铁异极相吸一样吸引着孙少平,产生一种“进城”的巨大向心力;另一方面,乡村文明本身的缺陷所带来的限制和伤害(尽管可能是隐性的),又像磁铁同极相斥一样推动着孙少平,产生一种“离土”的强大离心力。在民办教师的职位失去和孙家没什么变故的条件下,孙少平终于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走出双水村来到黄原城,实现了“进城”梦想。

二 城市化的进程——孙少平的“文明史”和“生活现实”

(一)孙少平进城的自主选择

在孙少平进城的自主性问题上,评论者意见不一。刘作武认为,孙少平“具有一般农民的保守又随遇而安的特性,缺乏积极主动性,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在孙少平人生路上的所有转折点中,只有‘离开双水村’这一步是由他自己走出来的,而这一点也是他凭着青春的激情,在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的情况下迈出的小小一步”。^[6]吴三冬则认为,由于孙少平主体意识的缺乏和丧失,为他人牺牲奉献所带来的道德满足中解脱实际上是“自我否定,自我摧残”,理由是,孙少平缺乏必要的自由,“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道德价值是毫无意义的”。^[7]应当承认吴三冬的说法有一定深刻性,但其显然忽视了“青春的激情”和“莫名的躁动”背后的实质。如前所述,孙少平进城具有必然性,迟早是要实现的,所谓的“不敢冒险的农民保守性”是论者强加的。吴三冬忽略了客观环境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和社会体制的极端乖谬,以及客观存

在的农民群体的“集体无意识”。

众多论者要求孙少平“超越”,企图让孙少平认识到“造成他卑微的根源”,要求他“变革现实”转变社会体制,进而获得“充分自由”,这未免不切实际。的确,城乡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城市是在不断对农村“吸血”的残酷过程中畸形发达起来的,社会体制的不合理带来了明显的社会不公。但直到今天,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不公平依然没有太大改变——至今我们都未能实现这一超越,又何必奢望30年前的孙少平实现呢?

另一方面,孙少平对社会已有所认识。在跟前往大牙湾矿区看望他的田晓霞的交谈中已经表达地非常明确:“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3]1028}这直接表明,孙少平认识到了他自己的困境,他绝非靠“牛马般受苦”的劳动来麻木自己的神经,摆脱对现实的关注;但是“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得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1]1028},这才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一症结所在恰被上述论者忽视了。

现实中,任何个体都要受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因为“人是历史的剧中人”,这对孙少平当然也成立。就孙少平所接受的有限教育和进行的有限实践而言,他认识到了社会制度的不公,但就个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去进行哪怕最细微的改变。他没有政治权力,没有社会地位(处于社会最低层),没有话语权。这些限制了他可能的反应,决定了他更多地只能采取“接受现实”的达观态度来面对生活。孙少平有着煤矿工人的生活经历。那一时期,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相当悲惨,矿工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危险,矿工们却几乎没有劳保设备,工时却无限延长,他们的身体饱经摧残,他们的婚姻无法保障,至于社会地位,更无从谈起。即便如此,矿工们的工资也不高。这当然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孙少平难道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问题的关键依然是,面对这沉重的生活,他能做什么?除了已经在做的,挖煤,念书,准备去报考学校以外,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社会本该做些什么,但却什么也没做,这是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几乎刻意的忽

略。而孙少平采取了认可和接受现实并力图有所改变的务实态度:他关注苏联、英国等发达国家的采煤效率,他考虑通过“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实现自身和煤矿的发展,这很明智。另一方面,他在物质上一度“赤贫”,不劳动就要挨饿受冻,就没有任何保障。牛马般的劳动之余,最需要的是身体的休息,而非高谈阔论地批判社会体制,那样做对他个人而言,直接的后果是经济收入的减少乃至消失。这是孙少平无法承受之重:钱给了他与别人一样平等生活的权利,给了他在家庭和亲人面前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钱给了他做人的尊严——就人而言,尊严本是天赋的,但是环境剥夺了他们的尊严,钱又还给了他。挣钱的一个前提是:认可,至少是要接受现实。

如前所述,孙少平的作为是在极度受限环境下的自主选择,具有充分的道德意义。借口孙少平没有充分的主体自由进而认为他的一切行为都缺乏道德价值,这是偏见。正是这一系自主选择和实践,终于逐渐实现了他的“主体城市化”。

(二)城市化的路径和方式

“离土”“进城”,是孙少平“城市化”的第一步。理论上,要“城市化”有两条可能的路径:主体城市化与客体城市化,即孙少平本自身城市化(可能在未来影响到双水村的城市化进程)与“双水村”城市化(进而带动孙少平实现城市化)。由双水村城市化而实现孙少平的城市化,在当时客观条件下实在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即使今天,我国依然有众多的农村没有城市化的迹象。因此,对孙少平而言,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是主体城市化,即他自己“进城”去。

然而“个体城市化”并非“进城”那么简单。“个体城市化”有三个层次,相应地,实现个体城市化也就有三个必要的步骤。

首先,个体城市化是身体城市化与身份城市化,二者同步或互有先后。身体城市化是指个人来到城市置身城市环境中,这是作为城市化实质内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城市化的前提,是个体城市化的基础;“身份城市化”是我国的奇特现象,却是孙少平所处的时代实现个体城市化的必要内容。身份城市化意味着国家或社会制度对个体“市民”身份的认可,因为农民是那个时代的二等公民,只有拥有“城市户口”才能享受以商品粮供应为代表

的城市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些服务的大门并不对“农业户口”的公民敞开(“农村人”的身份意味着没有机会进入到社会的“主流体系”,除了对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参军和考上大学)。对于身体城市化和身份城市化,前者是物理性的自我认同:来到城市,我是“城里人”了;后者是制度性的社会认可:拥有“身份”,你是“城里人”了。二者属城市化的第一层次。这一层次随着孙少平来到黄原县、户口转到城边上的阳沟大队与最终被铜城煤矿招工而逐步得到了实现。身份城市化还需要突破一重不公平的深层文化障碍——“城乡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城市是一个无形的堡垒,防守它的城门最为有力者就是‘城乡意识形态’。”^[8]

其次,个体城市化是生活(行为)方式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指个体在城市环境、人际交往等各方面影响下,逐步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城里人”的行为方式的过程,这是一个身份习得的过程。孙少平在原西县的高中阶段受到了城市化的初步影响,到黄原县城后受到的影响更深。进城后第一次回家时,孙少平“身上的伤痕被簇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3]639}——郑重场合的服饰层面,孙少平像“工作人”已“城市化”了。这是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具体体现。孙少平有空时想去影剧院里看电影(正是在准备看孙道临配音的《王子复仇记》时与田晓霞重逢)^{[3]654},等等,这些行为表明,孙少平正逐步“行为方式城市化”。

最后,个体城市化是思想观念城市化。思想观念城市化近似精神生活城市化,但这并不全面。思想观念城市化是最核心的城市化,是个体城市化完成的标志。孙少平的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城市化”了。在送妹妹上那赫赫有名的北方工业大学之前,孙少平“突然想到,还有几件女孩子最重要的用品要买。本来,这些东西应该由母亲为妹妹准备,可一个农村老太太绝对不可能备办这件事。哥哥嫂嫂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只知道农村的习惯……是的,他应该给妹妹买几条内裤,两个乳罩,几条卫生带……孙少平十分周详地想好了他要给妹妹买的全部东西”^{[3]945};孙少平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接受了城市。

当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城市化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终孙少平“城市

化”了——他终于是一个“城里人”了。这是他向文明生活迈出的艰辛一步,是他生活和命运的一次巨大转变。

三 城市化的意义和评价

面对困厄的环境,孙少平最终“城市化”了,实现了对无穷苦难的克服与超越,这是了不起的超越,是个人奋斗者对忽视乃至否定个人价值、无视个体独立性的社会环境的无声抗议和某种程度的反抗。同时,也需清醒地看到,他的精神成长虽有重要的个体意义,但是缺乏典型性,不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无法代表或代替与他同龄的青年(无论是与他同一煤矿的工人们还是与他同村的农民们)实现对苦难的超越;他更无力通过变革社会机制来救赎那些被苦难束缚的肉体和精神。孙少平不可被视为当代青年在“城乡二元体制”环境下自我解救并自我实现的典范和标本。

那么,对其成长应当作何评价?孙少平的城市化应当被视为“个人奋斗者”的悲壮胜利,也是“个人奋斗者”们的希望所在。不公的社会体制极度限制了孙少平们的生存空间,极度剥夺了孙少平们的发展机会,使他们通过合法途径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此情形下,他们通过在体制的夹缝里求生存,通过某些方面合理但不“合法”的“灵活”(例如,孙少平“城边上”户口的获得就是通过曹书记的个人关系,尽管曹书记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在此基础上,城边且是空头户口而非“城市户口”的孙少平却被只招城市户口的煤矿招工,就全亏了市委书记女儿田晓霞假冒父名在市上的“活动”,这些“灵活”帮他实现了转变),终于使他获得了体制某种程度的认可、经济上一定程度的解放和精神方面较大程度的自由,这几乎是出身于农村的青年个人奋斗者们20世纪80年代初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何况孙少平还拥有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例如任煤矿里的“班长”,有机会进煤炭专业技术学校学习等,获得了个人职业提升和发展的机会,甚至有望成为令人羡慕的“知识分子”(与煤炭有关的专家)——这是“土农民”们不敢想象的。精神上,孙少平“无论多么忧伤、痛苦,

却是很少绝望,更不悲观厌世”。^[9]总之,以孙少平的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孙少平的成长,其主要意义在于:他是特殊环境下个人奋斗者的标本。他的精神成长和物质收获,对同样孤独的其他个人奋斗者而言,具有范本意义——同时,对作为读者的我们来讲,具有激励和导向功能。其城市化的意义也主要在此。

青年的成长与奋斗,在《平凡的世界》中,通过孙少平“个体城市化”的方式,得到了系统的阐述;而该过程中孙少平的个人奋斗,则无疑具有历史穿透力和现实超越性,它激励我们在面对现实压力时要勇于去闯去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的救赎。孙少平面对苦难时顽强不屈的精神,不仅为我们带来审美的享受,也带来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可以断言,《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划时代的杰作。

参考文献:

- [1] 任葆华. 论路遥小说中的成长叙事[J]. 名作欣赏, 2008(1): 79-81.
- [2] 陈振彪. 个人奋斗者:独特的群像侧影——路遥小说研究(系列论文之三)[J]. 甘肃社会科学, 2000(4): 15-17, 23.
- [3] 路遥. 平凡的世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4] 张喜田. 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6): 66-70.
- [5] 庄孔韶, 王媛. 评议“离农”“为农”争论——教育人类学视角的农村教育[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79-83.
- [6] 刘作武. 谈《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价值观[J]. 语文学刊, 2005(10): 108-109.
- [7] 吴三冬. 孙少平的人格悲剧[J]. 小说评论, 1999(4): 48-51.
- [8] 徐德明. “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J]. 文艺争鸣, 2007(6): 48-53.
- [9] 李建军. 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J]. 南方文坛, 2007(3): 33-38.

责任编辑:黄声波